

Balancing Social Interest and State Security
Government's Strategic Choices on Trade Policy

平衡社会利益

和国家安全

——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

◆ 宋国友 / 著

时事出版社

Balancing Social Interest and State Security:
Government's Strategic Choices on Trade Policy

平衡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

——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

宋国友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衡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宋国友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0232-087-1

I. 平… II. 宋… III. 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中国 IV. F75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9973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375 字数: 352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1.00 元

作者简介

宋国友，1977年生，安徽休宁人。2006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国际关系博士学位。2005年8月至2006年7月曾作为“福克斯国际访问学者”在耶鲁大学国际和地区安全研究中心进行访问研究。2006年7月至今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研究方向和重点是美国经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等。

现已在《现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战略与管理》以及《国际经济评论》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另在《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和《东方早报》等媒体上发表国际时评近百篇。目前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参与省部级项目3项。

责任编辑：宿景祥

封面设计：杨 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序

宋国友博士的这本学术专著《平衡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而成的。与博士论文相比，本书内容更为丰富，更为全面地表达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学术思考。

在我看来，这本书有三大特色：

第一，研究角度新颖。国际贸易和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国际关系学界，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重点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但已有的研究更多地是沿着经济相互依赖是否会消弭国际冲突这一研究路径展开，而缺乏相反方向的研究，即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紧张是否会对经济关系产生影响。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在中日之间、韩国和朝鲜之间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尽管政治关系不稳定，安全关系紧张，双边贸易却有了长足的发展。面对这些貌似“反经验”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本书作者知难而上，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第二，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有所创新。该书试图构建的社会—国家的分析模型，突破了传统的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对已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必要的综合和补充。

具体来说，与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相比，这种社会—国家双重行为体的理论构想有以下特点。首先，该分析框架不同于单纯的利益集团分析，后者将国际政治完全看成是国内政治的对外输出，将个体或利益集团视作基本的分析对象，不仅努力地“去国家化”，而且忽视了跨国关系

对国内政治的塑造。与之相比，本书明确提出国家是世界政治领域的重要行为体，仍然具有极大的国际政治权威。其次，该构想也有别于结构性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将国家视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分析单位，只重视国家所处的外在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将外交政策当作国家利益的纯粹体现，而拒绝考虑国内行为体的作用，或者“要将国内政治的关切并入现实政治的框架”。本书对此做了很大的修正，认为国家虽然是国际政治的重要行为体，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行为体。本书认为，和国家行为体类似，社会行为体也发挥着重大作用。最后，本书的“社会—国家模型”与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和私人团体——跨国的和国内的——应是国际关系分析的主体也有相当差异。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仅仅是非政府社会行为体利益的集合和代表，国家的“人格”取决于社会的“人格”，跨国和国内的社会网络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对外行为风格和政策选择。由此一来，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性格就被忽略了。本书在认真总结相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不仅对自由主义国家观提出质疑，而且进一步抽象出国家行为体的本质特征，强调国家行为体有其独立的政策偏好，即维护国家安全。

第三，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为验证自己的理论构想，作者选取了冷战后美国对华贸易战略的制定以及韩国对朝鲜的经济政策作为分析案例。特别是前一个案例研究，通过深入而生动地剖析美国对华贸易战略制定过程，一幅波澜壮阔的中美经济关系图景得以呈现，美国各政府部门和利益集团在其中的折冲樽俎也跃然纸上，从而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在中美经贸关系狼烟四起、摩擦不断的今天，该研究对我国对美政策的制定是大有启示的。

宋国友博士好学不辍，自攻读硕士学位始，就开始跟随我研究中美关系。在研究过程中，又结合他的兴趣和专长，开始把中美经济问题作为他的研究重点，力图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在确定了博士论文选题后，宋博士又获得美国耶鲁大学“福克斯学者”项目的资助，赴美深造，在这一知名学府潜心撰写论文，在资料搜集和研究方法上获益匪浅。完成

序

❖.....❖
博士论文后，宋博士再接再厉，对这一课题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辛勤耕耘，遂成此书。宋博士治学敢于创新，有志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一点，我是十分欣赏的，也是我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一直所提倡的。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他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在又有这部学术著作问世，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十分高兴。谨以此序祝贺之，希望他在学术征途上奋发进取，不断有新的斩获。

吴心伯

2007年9月29日于复旦园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贸易增长与社会行为体	(12)
第一节 世界政治领域中的社会行为体	(13)
第二节 国际贸易和社会行为体	(25)
第三节 社会行为体的政治行为	(36)
第二章 贸易增长与国家行为体	(56)
第一节 国家和国家偏好	(56)
第二节 贸易增长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84)
第三章 在福利和安全之间：贸易 战略的制定	(98)
第一节 贸易政策的制定	(99)
第二节 作为外交战略的贸易政策	(117)
第四章 美国对华贸易战略分析	(136)
第一节 对华贸易、社会行为体和政策选择	(137)

引 言

冲突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到底为何？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不少学者的争论焦点。古典自由主义者坚持贸易会保障和平。康德认为，“金钱或许是所有大国最为倚重的力量。国家受此推动，而非道德的感召，去推动和平。”^① 孟德斯鸠也坚信，“贸易的自然结果是促进和平，两个彼此贸易的国家有着互益性的依赖。”^②

但是也有人同样基于贸易，得出相反的结果。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缔造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反问道：“迄今为止，贸易改变了战争的目标吗？”“因为商业而导致的战争，难道不和因为领土争端所产生的战争一样多吗？”^③ 他提出，贸易既是战争的原因，也是战争的手段。另一位贸易保护论者，德国的李斯特则指出，自由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忽略了贸易产生的具体政治现实，不仅“历史上的所有例子都表明，是政治联盟创造了贸易联盟，而非相反”，而且“贸易是强国反对弱国的手段”。^④

不过，无论支持或是否定贸易和和平之间的关系，早期学者更多的

①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 1957, p. 97.

②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版，第3页。

③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④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是直觉表述，缺乏细致的逻辑和论证。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弥补了上述缺憾，从多个角度提出各自的理论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三大范式：一是贸易促进安全；二是贸易导致冲突；三是贸易和安全的关系难有定论。

(一) 贸易促进合作，消除冲突。持此种论点的多为自由主义学者。一般来说，“贸易和平论”有如下几种逻辑演进。第一，在获取国家安全必需的资源方面，贸易取代战争成为主要手段。贸易扩展了国家获得资源或者实现特定物品生产的途径，从而降低了使用战争手段占取土地等排他性要素的概率。通过贸易和投资，国家可以同样取得以前只能藉由战争所获得的资源，比如石油等。贸易及其利益的增加，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动战争或对外征服的动机。^① 国家间贸易联系程度越高，以战争为解决手段的动机越弱，冲突也因此越少。第二，随着贸易的加强，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冲突的机会成本也随之提高。对国家而言，贸易国会通过贸易受益，而冲突或是战争会破坏贸易的进程，导致收益的降低和损失。所以，政治领导人会尽量避免和主要贸易国之间发生战争。^② 第三，通过对战争原因的理性分析，有学者指出贸易可以消除引发战争的根源。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大致有三种诱因：成本低、信息难以获取和怀疑承诺的履行。^③ 而贸易可以通过消除这些诱因而消除战争：1. 随着贸易联系的不断加深，战争的成本不断增长，战争越来越变得无利可图；2. 贸易在抑制冲突方面比增加征服成本更重要的是传递信息。由于缺少关于相对能力或决心的信息，或者有意错误传递这些信息，理性国家也有可能发动战争。而贸易不仅能够传递经济信息，而且在军事及安全信息的提供上，也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信息的获取使得误判变得很不

①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② S. M. McMillan,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May 1997, pp. 33—58.

③ J. D. Fears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995, pp. 379—414.

可能，从而减低了战争的风险；3. 国家间在经济领域的多次博弈能够外溢至军事和政治层面，使得某一国家能对另一个国家履行承诺有着比较充分的信心。^①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论证之外，自由主义者还提出贸易促进和平的其他理由，比如贸易能够重塑国家偏好以及贸易生成国际制度以保障安全等。

(二) 贸易引发冲突。与自由主义者相反，多数现实主义者不仅否认贸易是和平的来源以及贸易能够抑制冲突等观点，而且认为贸易增长会引发冲突。

其一，由于贸易增长而产生的国家间力量变化及权力转移会引起冲突。各国从贸易当中所获得的利益通常是不均衡的，贸易利益的不均衡会对国家间权力的重新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根据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力量变化是国家间爆发军事冲突的一个重要理由。^② 如果这种力量的转移发生在现状维持国和新兴大国之间，战争则更加不可避免。其二，贸易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于要素禀赋差异及市场规模大小不同，在贸易关系上，经常形成国家间依赖关系不对称的情况，A 国依赖 B 国可能要远甚于 B 国依赖 A 国。因此，贸易关系的恶化或者中断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那些对外依赖程度低的国家而言，其成本及损害会远小于对外依赖程度高的国家。在此种情况下，一方面，贸易所产生的利益不能有效约束贸易依存度小的国家率先引发冲突。另一方面，对外依赖程度高的国家有可能采用各种激烈手段以减少因这种高依赖性而导致的脆弱性。历史上，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就是其中的常见选择。^③ 其三，贸易本身也可能产生冲突。随着商业和贸易的增加，国家之间的接触面

^① K. Snitwongse, "Thirty Years of ASEAN: Achievements Though Political Cooperation", *Pacific Review*, Summer 1998, pp. 183—194.

^② John J. Mearsh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0, pp. 5—56.

^③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40—141.

也因之扩大，那些原本可能不存在的诸多经济争端也会随之出现。沃尔兹在谈论该问题时，强调贸易关系的紧密“意味着接触的增多，至少会使得偶然性（军事）冲突变得可能”。^①

除了上述主要观点外，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由于贸易关系的增强，一国愈发不能不考虑其他国家的经济目标而单独制定本国的经济政策，这意味着贸易联系使得一国的国家政策易受其贸易伙伴国的攻击。结果是贸易政策的歧见成为国家间冲突的起源。^②

（三）贸易和冲突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自由主义者和多数现实主义者对各自的理论推演抱有相当的信心，但也有某些学者坚持认为贸易和冲突之间没有逻辑的系统联系。

首先，他们认为贸易和平论者和贸易冲突论者都忽略了贸易可能同时产生合作与冲突的可能性。比如，贸易可以既增加某国与特定敌对国家接触的可能性，同时也可能促使该国对另一些国家采取遏止政策。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当预期未来的利益丰厚时，双边贸易会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反之亦然。^③ 其次，国家之间出现和平，原因也很可能不是贸易增长。在维护安全方面，有众多模式可供解释。核武器的出现、霸权稳定、均势制衡、合作安全、集体安全以及民主和平等，都可以用以说明特定地区的和平。贸易至多是和平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最后，很大程度上，国家之间的敌意与冲突不是贸易增长的结果，而是政治军事能力分配变化的结果。

总的来说，自由主义者以贸易利益为逻辑起点，强调国家间合作的可能，而现实主义者则立足权力，突出冲突的可能性。不管怎样，大多数学者的学术重点在研究贸易对冲突的单向影响上，对反方向的研

^① Kenneth Waltz, "The Myth of Interdependence," in Charles Kindelberger, eds.,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70, p. 205.

^② Barry Buza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Limits of the Liberal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84, pp. 597—624.

^③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96, pp. 5—41.

❖.....❖
究——国家间冲突对贸易的影响——却着墨甚少。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除了上述研究方向的缺失之外，还存在研究主体上的错位。就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大多数学者受结构现实主义的严重影响，基本上都将国家视为完全理性、统一和自为的行为体，国家独立于社会且在社会之上，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唯一对象。此即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e）。把国家作为唯一分析单位在理论研究上确有简约和便利的优点，但同时也产生了过分简单和僵化的问题，因此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如何透过国家的硬壳更为深刻地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已然成为众多学者努力的方向。

在贸易和冲突关系研究上，也存在过于突出和强调国家作用的误区，以至于造成对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力量和能动性视而不见的弊病。很显然，贸易增长是经济积极交往的结果，而交往的主体毫无疑问是公司和个人等。因此，正如贸易政治学所揭示的，与其说贸易政策的输出是国家力图规范社会行为体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国家行为体对国内社会各种经济利益的变化和聚合所做出的反应。

如果仅仅从贸易的角度来框定行为主体，也会产生主体错位的缺陷，进而影响分析的准确性。在国内社会行为体的掣肘下，国家的作用和独立性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不能被看成一个单一主体。但问题在于，贸易增长及其后果会引发安全外部性，而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政策领域，国家确实拥有其他社会角色不能企及的能力和主导愿望。在国家安全的压力下，政府不但不能置身度外，还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对微观行为者的贸易活动加以引导和调控，使之尽量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这意味着不能过分夸大社会所起的作用。

本书主要研究在（潜在）冲突之下的对外贸易战略选择问题。为更好地进行论述，本书构建“社会—国家”的分析框架以更为贴切地描述贸易和冲突主体的双重性。

“社会—国家”模型将国内社会力量的作用和国家的外在安全敏感性及战略选择加以结合，强调不仅必须通过社会行为体的视角来了解国家

行为，而且也必须在国家属性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力量。本书作者认为，通常来说，国家拥有军事力量，社会拥有经济力量，社会/国家的复合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搭配构成了国际关系的真正本体。从这点上说，这不是对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的彻底颠覆，而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因为以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各派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国家本体和社会本体，只不过缺少将两者的联系。

必须注意的是，社会和国家本质上虽然互嵌，但两者在偏好以及由偏好所引起的利益识别上差异甚大，并因此导致不同的行为逻辑。^① 根据国际关系理论的通常假设，国家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下，而国内行为者生活在有秩序当中。^②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必须自助，首先要确保生存和安全，然后才是其他目标，比如追求权力。但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并不是安全，因为并不直接面临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压力，最大限度地争取经济福利成为他们的主要行为目标。

偏好的不同决定了行为逻辑的差异。总体上，国家行为遵从安全最大化逻辑，力图建立扩大与他国的安全优势；而社会体的行为依照福利最大化逻辑，以提高个体福利为各种活动的出发点。贸易活动能够产生福利，当它局限于一国之内时，安全逻辑和福利逻辑无涉。但是当贸易不仅跨越国界而成为国际贸易，并且产生显著的安全外部性时，国家的安全逻辑与国内行为体的福利逻辑就会产生矛盾。矛盾的结果是什么？现实主义因为只设定国家行为体的存在，便自然地认定安全逻辑占优，认为在存在严重冲突或威胁的情况下，贸易将受到抑制。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保护性甚至限制性的贸易政策，如禁运，将会被实施。而自由主义者刚好相反，认为各种社会行为体首先考虑福利实现，即使发生了

① 对于偏好的产生，有结构基础论 (structure-based) 和行为体中心论 (agency-centered) 两种解释。两者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偏好是外生的，而后者坚持偏好是内生的。参见 William Roberts Clark, "Agents and Structures: Two Views of Preferences, Two Views of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Summer, 1998, pp. 245—270.

② 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接受此种观点。

冲突，这也是经济领域的冲突，通过合作和协商，贸易不但能得以继续，而且会消除可能的安全冲突。冲突与贸易并行不悖的现象表明，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由于过分强调单个主体的作用，忽视了两个行为体互动与融合，所以导致了理论的解释困境。

依照“社会—国家”的行为主体模型，并结合不同行为体的安全和福利偏好差异，本文认为冲突下的贸易增长（与战略对手贸易）是强调福利逻辑的社会主体和注重安全逻辑的国家主体互相竞争和妥协的结果，而政府对外政策的最终输出——是更强调安全还是强调贸易——则不仅取决于不同行为体的博弈能力，而且和一国的政治制度高度相关。此外，本书作者还认为，行为体的博弈能力是由议题领域的属性而决定的，不同的行为体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不能笼统地认定国家或者社会在任何议题上都占据着强势或者弱勢的地位。很显然，国家行为体在诸如对外安全战略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领域要比社会行为体更具影响，而在“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性质更强烈的贸易政策领域，社会行为体的作用则超过国家。^①

从行为体偏好和行为体能力两个方面衡量，国家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博弈可能对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② 第一，国家完全超越和统治社会，基于未来冲突的可能性，一国政府会采取停止与特定国家贸易的政策，如贸易禁运。第二，社会行为体的作用发挥到极限，政府对国家安全的考量服从且服务于贸易利益，如与敌手订立贸易自由协定。第三，国家和社会在竞争中合作。政府的对外政策既反映了国家行为体的安全要求，也维护了社会行为体的经济福利。第三种结果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社会更多地与国家合作，在国家的政策框架下开展贸易行为，如大规模的经济制裁以限制国内行为体同

^① 另外，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发挥媒介作用的制度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制度安排的不同，制约了社会成员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

^② 本书是分析冲突之下的贸易行为，那些不存在冲突诱因或冲突现实的国家之间，不应用此模型来推演。